

# 流动人口二代

## 社会融入状况的实证研究

### ——基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分析

张庆武 卢晖临 李雪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成为促进维持城市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即流动人口二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困境的同时，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问题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需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状况，本文以北京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了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并从经济、生活、制度和文化的4个方面对其社会融入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实证研究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流动人口的加入为我国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也逐渐凸显，引起了广泛关注<sup>[1]</sup>。然而，当前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民工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和白领新移民等，未涉及流动人口二代<sup>[2-8]</sup>。随着流动人口长期扎根城市，很多流动人口二代在城市出生、上学、成长甚至工作，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sup>[9][10]</sup>。这些人从小远离农村，受城市生活与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社会融入呈现出新的特征<sup>[11][12]</sup>。

北京是流动人口最早流入并大规模集聚的特大城市之一，由于城市功能发达对于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移民特征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虽然存在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制度

壁垒，但还是有很多流动人口后代就在这个城市出生或者成长，并随着进入务工年龄而留在城市工作。这一被称作“流动人口二代”的青年群体（以下简称“流二代”），其规模在北京已经以数十万计。作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的一个子群体，他们的身上带有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很多特点，但是由于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社会化基本上是在城市完成的，也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行为特征和情感价值倾向，为凸显这个群体的特征，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流二代从流动人口中单独分离出来加以考察。

基于此，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从经济、生活、制度和文化的4个角度，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调查对象为北京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中在北京务工的青年，本次调查共发放3523份问卷，回收3275份问卷，有效率为93%。按照以下条件确定有效的调查样本：（1）1980年之后出生；（2）外地农村户或城镇户；（3）来京时年龄小于16岁（含）；（4）在

京居住5年以上。本次调研按照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分布密度进行抽样,覆盖北京市16个区县,样本能较好地反映整个北京流动人口二代务工人员的实际情况。

## 二、群体的主要特征

调查发现,北京流二代务工人员主要有以下4个特征。

### 1. 城市为本,远离乡村的一代

调查显示,流二代的平均年龄24.3岁,而平均在京居住年限为15.7年,即流二代群体大约65%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其中,52.6%的流二代从未在除北京和老家之外的地方长久居留(半年以上),25.5%的流二代在北京出生。对于很多流二代来说,北京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环境,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世界。

同时,将近6成的流二代不知道老家有多少亩耕地,3/4的流二代已经在现实上和情感上与土地脱离了联系。超过6成的流二代与老家仍然维持着周期性的联系(每年回去1~2次和每年3次以上),但是,有接近4成的流二代与老家的联系已经非常疏远(从没有回过老家,或者是几年才回去一次)。对于这部分流二代来说,故乡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罢了。他们甚至写不出故乡的名字:31%的流二代写不出老家所在乡镇的名字,19.6%的流二代甚至不知道老家所在的县(区)的名字。

### 2. 良好教育,看重职业生涯和发展的一代

同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相比<sup>[13]</sup>,流二代的教育水平有大幅提升。有34.2%的人具有高中学历(含职高、中专、技校),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到40.9%,二者合计高达75.1%。这也反映了流二代及其家庭更高的教育追求和更强烈的通过教育改变地位的期望。

表1:不同代际农民工教育程度对比(%)

文化程度	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流二代	农村户籍流二代	城镇户籍流二代
小学及以下	18.9	6.7	1.7	1.8	1.4
初中	65.2	64.4	23.2	25.9	10.1
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	14.5	22.5	34.2	34.4	33.2
大专及以上学历	1.4	6.4	40.9	37.9	55.3

在职业选择上,“流二代”的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商业工作人员”(20.7%)“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3%)“餐饮服务工作人员”(15.5%)“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2.3%)4个职业大类。北京团市委2012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以下新生代农民工数据均来自此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当中从事餐饮服务的比例最高(25.2%),其他比较集中的有制造业(13.4%)和建筑业(10.3%)。可以看出,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流二代人员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与其父母(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就业状况的差别非常明显:流二代从事个体商贩的比例比第一代农民工大大降低,由父亲(36%)、母亲(28%)的3成左右降低到不足2成(16.7%),而担任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大上升,由父亲(34.7%)、母亲(31.9%)的3成出头上升到8成以上(80.9%)。这种差别既是两代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差别的结果,也反映了流二代在选择工作时对于体面、稳定性和发展前景等目标的主观追求。“挣钱多”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特征,不过“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前景大”“工作稳定性高”也已经成为流二代找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 3. 家庭完整,追求稳定生活的一代

绝大多数流二代的父母都在北京或者有一方在北京(分别为73.6%和18.1%)。接近7成的流二代与父母(或其中一方)住在一起。在个人婚姻状况方面,30%已婚、28.3%未婚但有男/女朋友。在已婚或有男/女朋友的“流二代”务工人员中,78.7%的人的配偶或男/女朋友也在北京工作,4.9%的人在同一城市但未就业,同城比例高达83.6%,相对来讲这部分人比较稳定。已婚流二代中,近7成已经育有子女。

流二代不仅在北京有着比较完整的家庭生活,而且维持着显著大于北京户籍人口的家庭规模。调查结果表明,73.6%的流二代家庭成员数量在4人及以上,平均家庭人口数至少为4.17人。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为2.45人,而且随着流二代家庭在北京居住年限的增加,流二代家庭人数增加、家庭结构完整的趋势也越发明显。(见表2)

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支持,催生了流二代对于稳定生活的偏好和追求,在回答“最希望得到的帮助”这个问题时,有41.7%的流二代受访者选择了“稳定的生活”,位居第二,与“平等的户口政策”(41.8%)这一具体可见的目标相差无几。总体上看,流二代的职业流动性要低得多。

表 2 :流二代在京居住时间与家庭人口规模 (%)

家庭人口规模	在北京居住时间			小计
	0~5年	6~10年	11年以上	
1人	7.5	10.7	4.9	6.3
2人	10.0	8.7	6.9	7.4
3人	20.0	16.4	11.1	12.7
4人	17.5	27.8	32.4	30.9
5人	25.0	20.7	23.5	22.9
6人及以上	20.0	15.7	21.2	19.9
小计	100.0	100.0	100.0	100.0

#### 4. 权利萌生，行动能力强的一代

流二代在北京这个城市生存，也和第一代流动人口一样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们所追求的生活却和第一代流动人口单纯追求收入增加等经济利益有所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融入意愿，也有着更强的权利意识。调查显示，有 41.7% 的人希望得到稳定的生活，有 41.8% 的人希望得到平等的户口政策，超过了提高收入（35.6%）所占的比例。同时，24.8% 的人希望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22.9% 的人希望得到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帮助，这些都是在城市长期生活繁衍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以看到，在流二代中市民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萌生，他们不再仅仅将城市作为短期的栖息地，而是越来越考虑到长远发展的可能性。

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有 24.3% 的人选择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13.7% 的人选择找当地政府部门解决，也有人选择通过网络曝光（9.0%）等新媒体形式诉求权利。这个比例不仅远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也大大超过了新生代农民工。流二代的教育程度高，乐于接触网络，懂得运用新媒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是行动能力强的一代。

### 三、社会融入状况

结合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成果，本文结合调查问卷从经济、生活、制度和融入 4 个方面对北京流二代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sup>[5, 8, 14]</sup>。

#### 1. 经济融入

作为“城市化的务工青年”，流二代绝大多数以家庭形态生活在北京，并追求稳定的生活。家庭形态对于住房、工作、收入、社会保障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些方面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

融入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反映了流二代社会融入的经济层面。

调查显示，北京流二代务工人员的平均收入为 3406.51 元，收入最为集中的 3 个区间分别为“1500~2000 元”（22.2%）、“2000~3000 元”（39.7%）、“3000~4000 元”（13.7%）。平均花费为 2146.8 元，平均剩余为 1259.71 元。但仍有 18.8% 的人每月没有剩余，说明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在京“流二代”务工人员的生活比较拮据。“吃饭日用品开支”“支付房租水电费用”的基本支出是被调查者日常开支花费最大的两个方面。其中，平均房屋租金达到 1398.37 元，说明了他们整体的收入水平不高，恩格尔系数较高，收入很大部分都用作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见表 3）

表 3 :流二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开支对比

	月平均收入 (元)	月平均花费 (元)	月平均结余 (元)
流二代	3406.51	2146.8	1259.71
新生代农民工	2558	1476	1082

流二代的住房条件表现出 3 个特点：第一，自购房比例可观，达到 16.7%；第二，租房比例上升，为 69.3%，其中独租比例为 43.9%；第三，住集体宿舍的比例降低，其生活表现出“离职场化”和“回归家庭”的趋势。然而，调查数据也表明，流二代的居住状态与维持一个完整家庭正常生活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将近四成的流二代是与他人合租或合住的状态。从住房面积看，超过一半（53.2%）的流二代居住面积小于 40 平方米。考虑到 3 成左右的流二代家庭从事商贩工作，经营场所往往和居住场所合一，再加上家庭平均规模多达 4.17 人，这样的居住条件与北京城镇户籍人口人均 29.26 建筑平方米的状况差距显著<sup>[15]</sup>。

排除从事小商贩等自我经营等情况，流二代务工人员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38.4%，对比 2009 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sup>[16]</sup>，第一代农民工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61.6%，可见北京流二代的就业保障方面比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的进步。相比 2009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流二代的社会保障状况也有明显的改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47.0%、43.6%、49.8% 和 37.1%。

考察在京流二代务工人员对自身目前经济情况



的评价, 25.7% 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不错, 50.7% 的人认为只是过得去, 同时还有 21.1% 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好。其中, 58.9% 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层或中下层, 而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底层的流二代务工人员达到 39.2%。

## 2. 生活融入

社会生活是体现社会融入状况的直接体现, 生活融入方面则主要从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流动人口而言, 生活方式既是他们“城市化”水平的表现, 又会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对于有城市成长经历、城市工作, 同时又保持着非城市户籍身份的流二代务工青年来说, 他们的观念意识的转变体现在日常城市生活中许多微小而具体的细节方面, 新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群体社会阶层的塑造和形成, 制造出他们的“城市性”, 同时也制造了他们城市生活中社会身份的边缘化。

闲暇活动类型是判断一个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 流二代的休闲娱乐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休闲方式的现代化和城市化, 这体现在“上网”这一现代的休闲方式成为该群体的首选(高达 64.2%), 而“看电视”“逛街”和“找朋友玩”作为城市人特别是城市青年人的流行休闲方式在流二代中也相当普及。二是由于外来务工青年的工作强度大, “休息”也占据了他们原本不多的闲暇时间中的重要一项(29.8%), 为劳动再生产提供必要的后续保障。三是“做家务”(13.0%)“帮父母工作”(7.2%)也在流二代的闲暇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方面反映了流二代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在北京拥有相当完整的家庭结构的群体特征, 也反映了这些流二代务工青年在休闲时间仍要承担一定的家庭生活负担。四是传统休闲方式的式微, 这体现在“看书报”(9.1%)“打牌、打麻将”(5.0%)“听收音机”(1.6%)等几种活动的比例很低。五是流二代作为受过良好教育、注重职业生涯和发展的代, “参加学习培训”也成为他们在休闲时间选择的的活动之一, 尽管这一比例仅占到 6.2%, 却反映了部分流二代积极上进的精神。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流二代的休闲方式更为多元化、城市化。

人际交往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维度之一, 与谁交往、如何交往、交往面有多宽直接体现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在京的流二代务工青年最主要的朋友来源由高到低分别是同学(31.6%)同

事(27.2%)同乡(20.0%)。此外, 亲戚占流二代朋友来源中的 13.9%, 邻居占 5.1%, 网友则占 1.9%。根据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 通常将亲戚、配偶归为亲缘关系, 将同乡归为地缘关系, 将同学、同事归为业缘关系。其中,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传统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 业缘关系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重要性上升。在流二代这里, 可以看到, 同学、同事的业缘关系已经超越了同乡的地缘关系以及亲戚的亲缘关系, 成为这一群体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

对流动人口来说, 与北京本地人的交往既是衡量他们城市融入程度的指标, 也对他们在其他层面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问及朋友中是否有北京人, 在京出生和非在京出生的青年情况较为一致, 43.6% 的人有 1~2 个北京人朋友, 36.6% 的人有 3 个及以上北京人朋友, 19.8% 没有北京人朋友。同时, 在京出生的流二代没有北京朋友的概率要低于非在京出生的流二代。

## 3. 制度融入

制度融入标志着流动人口在结构层面城市融入的完成, 表现为流动人口加入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 参与城市公共生活。

调查显示, 该群体平均年龄 24.2 岁, 在北京平均居住时间 16.2 年, 而且近 80% 的是整个家庭都在北京, 也就是说其 2/3 的时间在北京有完整的家庭生活, 但超过 3/4 的流二代仍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城市融入方面, 38% 的认为“北京亏待了外地人”, 42.1% 的表示曾经“受过北京本地人的歧视”, “没有北京户口”仍然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痛苦, 阻碍着他们的融入。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 68.2% 的被访对象表示没有在北京参加任何组织或群体, 即其组织化的固定社会参与为零, 而其余各类组织的参与率也都不超过 10%。流二代参与率最高的社会组织为“志愿者组织”(10.0%), 其次则为“同乡会”(8.0%)“党团组织”(7.2%)。工会及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与率仅为 6.6% 和 3.6%。

社会组织及群体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获得归属感的重要来源,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流二代对这类组织的参与度还很低。考虑到被访对象在政治面貌上有 36.6% 的人为共青团员, 7.5% 为中共党员, 但其真正参与到党团组织中的比例仅为 7.2%, 可以说党团组织的工作在该群体中还有较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总体而言, 调查对象对于社区举办活动的参与度不高, 仅有 2.9% 总是参加。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

越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这一调查结果与以往理论及研究是一致的,例如许传新等根据2006年进行的“成都青年农民工状况调查”数据,发现参与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更倾向于不认同农民身份<sup>[17]</sup>。

当前,80.6%的流二代希望企业或政府提供平台来满足他们对于户外活动、文娱活动等文化活动的需要。因此,政府可加强基础活动场所、设施,诸如公园、运动器械的建设,企业则要根据员工需求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

#### 4. 文化融入

已有的移民社会融入理论及相关研究表明,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是移民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只有在这个层面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才真正融入了城市。这种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北京这个城市的态度及评价,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自身城市身份的认同。

(1) 城市认同方面。本次调研的被访对象中有45.6%的人表示对北京“非常喜欢”或“比较喜欢”,39.8%的人表示对北京的态度为“一般”,另有14.7%的人对北京的态度为“不太喜欢”甚至“非常不喜欢”。其中,“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人与“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的人相比,更喜欢北京。

60.8%的被访对象表示“非常关心”或“比较关心”北京的发展,29.6%的人关心程度为“一般”,另有9.6%的人对北京的发展表示“不太关心”或“很不关心”。其中,“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人与“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的人相比,更关心北京的发展。

对比北京团市委在2012年的调研数据,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二代群体在对北京的喜爱程度及对北京发展的关注程度上并没有显著不同——尽管他们有更多的在北京的成长和生活经历。这表明外来农民工群体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仍将是漫长的发展过程。

(2) 身份认同方面。身份认同是指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sup>[4]</sup>。并且,现有移民研究已表明,身份认同层面的融入对子代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大于对第一代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对流二代在京务工青年来说,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多年,只有当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只有当他们

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因此,身份认同是城市融入的最高境界,与其他层面的城市融入相互作用。但是,其他维度的融入不一定导致身份认同,即便外来务工人员在其他层面(如经济、生活方式)有了较程度的融入,他们仍可能始终保持一种异乡人的心态。

尽管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对老家的记忆渐已模糊,尽管所居住的社区并没有明显的社会区隔,人员结构并不单一,尽管只有极少数人(14.7%)不喜欢或非常不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尽管也有一定规模的北京朋友,但仍然有78.8%的被访对象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仅有21.2%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尽管存在群体内部差异,仍然可以说,对北京缺乏归属感和地域认同已经成为流二代务工青年遭遇的普遍性问题。相比之下,外地城镇户籍的流二代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的比例(25.4%)要明显低于外地农村户籍(20.4%)。

对于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务工者来说,没有北京户口(76.0%)、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52.8%)、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31.3%)是他们“非北京人”自我认识的最主要原因。

被访的流二代群体成员最愿意接受的称呼是“新居民”(34.8%)、“流动青年”(30.1%)这样中性的、模糊的、没有地域归属含义的称呼。35.1%的人愿意接受“外地人”“打工者”这样的称呼,对“外来工”“农村人”“农民工”的接受程度则很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流二代群体的乡土性身份认同大为下降。

流二代群体从小远离农村生活,对家乡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家乡的认同都在消退,与家乡的心理距离日渐拉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城市的主流社会之外,依旧是无根的漂泊者。因此,流二代群体对自己的身份总体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是心灵上漂泊的一代。他们在城市中漂泊,在归属感中彷徨,不断追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导致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遭遇“谁也不是”“谁也不属”的迷茫。

## 四、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通过本次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北京流二代社会融入的因素主要有3个方面:

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城市融入受限  
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



乡分割是农民工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学界对此已基本形成共识。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资源之外。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群体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流二代务工群体主观上也已经对这一境况有明确的认知，这在本次调研中体现在他们将“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没有房子”“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作为他们觉得自己还不是北京人的主要原因。

2. 低社会参与，各类组织及群体对流二代的关注和吸纳不足

公共意识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公民们通过公共参与感到自由的尊严并获得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公共意识看重的基本价值是社群福祉、团结、承诺和归属，并认为这些价值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全体成员共享的生活本质，成员将会因为参与共同体的活动而体会到这种生活本质和这种深层的分享关系，进而产生共生感和认同一致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制度融入是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重要环节。然而，本次调研结果显示，流二代务工人员对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仍然非常低。超过60%的被访对象没有加入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社区组织、党团组织、企业工会，还是其他各类社会团体，对流二代的容纳度都还很低。在公共生活方面，企业、社区、政府为流二代务工人员群体提供的公共活动尚不能满足他们的活动需求。这一状况不利于流二代的城市融入。

3. 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的冲突

文化层面的融入受制于，反过来也加速或阻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经济融入过程；文化融入还作用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行为适应，使他们更好地适应主流城市文化。同样地，理念上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也会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对整体的城市融入至关重要。

尽管调研结果显示流二代群体成员作为在北京成长、工作甚至在北京出生的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与老一代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已经更为现代化和城市化了，但由于其在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尤其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下他们边缘化的外来身份，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仍然与城市主流文化有所隔阂。这体现在被访对象在谈及与北京市民交往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时，被提及

最多的困难就是“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地位差异”。

## 五、政策建议

流二代的未来，不仅关乎这个群体本身的利益，而且由于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其父辈（第一代流动人口）辛苦打拼的希望，他们的未来也关乎到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利益。流二代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部署，如通过新农村建设，吸引部分流二代回乡务农创业；通过城镇化建设，吸引部分流二代回到中小城镇工作生活。但是，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基于流二代“回不去”“追求城市稳定生活”的现实处境与特征，将他们直接引导回乡或到其他城市的可行性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北京市流二代问题的解决，亟须北京市出台相关政策，实施相关举措。

基于本项调研，笔者分别从制度与技术层面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期通过制度手段保障流二代的相应权益和改善其物质条件与经济状况，并通过技术手段促进流二代的城市融合，降低冲突抗争的发生率。

1. 制度层面

流二代是城市化的务工青年，正面临着沦为城市边缘化群体的危险。如何弥合流二代在物质条件和经济状况方面与城市生活需求的差距，是当前的紧要任务。为此，笔者从制度层面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制度屏障是流二代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应尽快出台让流二代群体看得到希望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不断探索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又能能为流二代提供一定保障的户籍政策。对在京工作一定年限、有固定住所和职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流二代，择优为其办理高等级居住证或进京户籍。由此保障流二代在就业、医疗、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在制度层面将他们纳入城市。

第二，从制度和规划上整体考虑包括流二代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如上所述，追求稳定已经成为流二代城市生活中的最高需求。而对于在城市中拥有完整家庭的流二代而言，为他们提供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住所条件，将具有重大意义。针对流二代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运用政府支持、市场融资和农民工集资等多种手段来建造廉租房，逐步解决流二代在城市的居住问题。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应正视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已经成为城市低端人口集聚地的现实，结合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改造计划，

创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将现有出租屋改造成为“集体土地廉租房”，为符合条件的流二代提供合法稳定的居所。

## 2. 技术层面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流二代务工人员群体自身的一些特点，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地位仍然是边缘化的，他们在生活中面临多个层面的困难，在城市社会中可能经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流二代务工人员有了更为明确和强烈的公平意识、权利意识，更有可能通过集体行动等途径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其权益诉求与抗争能力不断增强。以上两点是对流二代群体进行研究时不可回避的话题。为了改善该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也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这里我们针对流二代群体的信息传播及利益诉求的特征和趋势，尝试从技术层面提出3点对策建议。总的思路是，若要减少流二代采用非制度化的诉求抗争方式，引导其诉求抗争方式的制度化，就必须降低他们制度化诉求抗争的成本。

第一，搭建网络平台，加强政府与流二代群体的信息沟通。互联网已经成为流二代务工人员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从政府部门获取信息的机会不足，这表现在他们对政府信息较高的信任程度和极低的实际使用上。针对这一状况，政府方面可以搭建适合的网络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一方面，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正面、主流的价值观念及与流二代群体切身相关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流二代群体也可以

通过网络更顺畅地向相关政府部门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网络平台的搭建将有利于形成政府与该群体间的良好信息互动。

第二，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及群体的引导作用。本次调研结果表明，流二代务工人员群体对各类社会组织及群体的参与程度很低，他们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自然也就很少向这些组织及群体求助。这表明，各类社会组织对流二代务工群体的关注和吸纳不足，若能及时转变观念及发展策略，有望在引导流二代务工群体用适当方式争取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可能的方式包括在社会层面通过社区组织，在政府层面通过共青团组织，在企业层面通过工会组织更多地对该群体进行吸纳及引导。

第三，提升法律意识，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及法律援助。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流二代务工群体与第一代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比，已经更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自己面临的不公正待遇，这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构建和谐社会。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流二代务工群体的法律知识及实际运用水平仍然是有限的，有必要为该群体提供更多的法律知识培训及相应的法律援助，以减少其进行体制内利益诉求的成本，逐步引导他们诉求抗争方式的制度化。

张庆武：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李雪红：共青团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 / 程旭辉

## 参考文献：

- [1]任远, 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J]. 人口研究, 2006(3): 87-94.
- [2]刘建娥. 从欧盟社会融入政策视角看我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11): 106-112.
- [3]杨聪敏. 农民工权利平等与社会融合[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0.
- [4]杨菊华. 从隔离, 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9(1): 17-29.
- [5]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5): 117-141.
- [6]丁宪浩. 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 财经科学, 2006(10): 223.
- [7]李培林, 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 2012(5): 1-24.
- [8]杨菊华. 社会排斥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J]. 人口研究, 2012(5): 69-83.
- [9]胡宏伟, 等. 差异与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联动分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1(4): 79-94.
- [10]王明学, 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1): 31-38.
- [11]张旭晨.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社会融入政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 [12]朱力. 农民工二代与中国未来[J]. 人民论坛, 2011(24): 337.
- [13]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J]. 数据, 2011(4): 68-70.
- [14]侯力, 解柠羽. 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的障碍研究[J]. 人口学刊, 2010(6): 184.
- [15]陆学艺, 宋贵伦. 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13)[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数据, 2009.
- [17]许传新, 许若兰.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07(5): 39-44.